

產業轉型 貧富懸殊

內地與香港同病相憐

貧窮問題已成為中國的大包袱，香港現時亦面對貧富懸殊的問題。

從「十二五」規劃，可以看出中國未來5年的發展方向與目標。可是，如果從反面去看，也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目前面對的難題；在幾方面，跟香港的難題相當類似。

首先是產業結構轉型的問題。1979年改革開放，是中國產業結構的第一次轉型，由完全計劃經濟，轉向既有計劃經濟，也有市場經濟，而市場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大。下一個5年，中國將要第二次轉型，由「製造業強、服務業弱」，轉向服務業及高增值產業。2008年金融海嘯後，歐美市場萎縮，復蘇無期，出口難再迅速的增長，製造業佔GDP的比重漸到極限。不轉型，便保不住過去30多年來平均7%的增長。

六大產業 只聞樓梯響

香港已完成向服務業轉型，90%以上的GDP來自服務業，可惜香港卻嚴重的向金融業及地產業傾斜，四大中心產業及六大大優勢產業中的其他行業，不單發展緩慢，而且看不出何時可以起飛。雖然中央要員（例如溫家寶總理）千叮萬囑特區政府，要促進產業平衡發展，但到如今，還是只聞樓梯響，未見成績。

其次是貧窮的問題。貧窮線怎樣釐定，每個地區都有不同標準，聯合國有個標準（每天僅僅足以維生的生活費少於1美元），世界銀行另有一個標準（每天生活費少於1.25美元）。中國1985年首次計算貧窮線，以每人每天消耗2100卡路里來推算，低於國際標準。2009年，中國用1196元人民幣作為貧窮線，貧困人口即從2008年的約1480萬，增至4300多萬人口，增加了3倍。

貧窮問題 是個大包袱

若按聯合國標準計算，中國的貧窮人口應是1.5億；按世界銀行標準，則高達2.5億。隨着通貨膨脹加劇，物價上升，貧窮線也要提高，假若定在1500元，那中國的貧困人口便接近1億，令人咋舌。中國的貧窮問題，是個大包袱、大難題。

以上說的只是絕對貧窮的人口，更嚴重的是相對貧窮及貧富懸殊問題。以堅尼系數作標準，0.4是分界線，超越了0.4，便可能引起社會不安乃至動

盪。在香港，絕對貧窮的人數不算多，且有社會福利的安全網，還未算是大難題。可是，物價上升，生活質素下降，中產階級，尤其是年輕人，覺得沒有上進階梯，民怨積累，導致仇富情緒。

內耗加劇 港管治困難

在中國大陸，由於腐敗問題嚴重，導致仇官，城鎮每年都發生不少群體性事件，政府要耗費大量資源，維持社會穩定。在香港，社會撕裂，反建制與建制派的對立日趨激烈，沒有妥協餘地，內耗加劇，政府管治舉步維艱。

「十二五」規劃，首次提出要從強國向富民轉型。既要求增長，即維持GDP每年平均增長7%，也要保障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，以及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，每年的平均增長要超過7%。如此一來，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，才可以同步提高，居民生活才算有實質改善。若只是增長7%，那便等於原地踏步。然而，目標是這樣訂定了，能否做得到，卻是另一回事。不過，話得說回來，內地有這樣的目標，至少比香港好。特區政府還沒有這樣的目標呢！（四之三）

撰文：博文

知識點

部分5年規劃未達標

別以為中央政府坐擁巨資，又有無上的權力，就一定可以按5年規劃完成目標。有些目標，經歷了幾個5年規劃，都無法完成。譬如：教育經費佔GDP的比重定在4%，一連3個5年規劃都沒有達標，還要拖到2012年。此所以中國雖富起來，許多地區還是要籌款辦學。另外，科技投入佔GDP的比例，2001年定下1.5%的目標，但沒完成；2005年定下2%的目標，2010年也沒完成，拖慢科技興國的步伐。最嚴重的是貧富懸殊問題，2004年，中央已起草方案要拉近貧富差距，但到2009年，中國的堅尼系數已接近0.5，仍未有具體、落實的改善方案。

通識我見

國力提升
還需民主配合

德雅中學 高三 羅雅冰

近年來不難聽到「中國崛起」的言論。無容置疑，中國在經濟、科技、國防等方面的發展一日千里，在國際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。可是，在如此風光的外表下，中國的內部條件又有否跟得上步伐呢？

劉曉波、艾未未的名字，我們耳熟能詳。劉曉波及艾未未都被當局視為異見分子，前者仍然身陷牢獄，而後者則一度被囚。兩人的事都惹起國際間的熱烈討論。

沒錯，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斷急速上升，為不少中國人脫離貧窮。一個國家的國力除了經濟等「硬件」外，還需衡量民主等「軟件」。在國際標準看來，中國的民主程度仍有頗大的進步空間。身為中國人，我實不願意看到中國政府只着重數字的增長，忽略了一個和諧社會必備的條件——民主。因此，我誠懇的希望中國政府能停一停下來，好好發展民主，締造一個和諧的社會。

百物騰貴
食住都成問題

梁文燕紀念中學（沙田）高三 陳曉瑩

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，經濟發展日益急速。然而，在城市的光景下卻埋藏不同的炸彈。來勢洶洶的通脹，壓得普羅大眾喘不過氣。香港的生活必需品主要依靠入口，人民幣升值造成輸入型通脹；百物騰貴，但薪金的加幅遠追不上通脹，令升斗市民百上加斤。庫房經常水浸，政府應出手壓抑通脹。政府可仿照醫療券的做法，向中下層市民派發食物券，當市民到指定超市購物時便可使用，這可減低人們的生活壓力。

除了糧食價格攀升，住屋也是另一大問題。高企的樓價令許多人無法置業。經濟能力稍好的人支付高昂的金額租屋，但一些基層市民只可租住小單位、板間房等，生活環境惡劣。正所謂「安居樂業」，有適當的居所，人們對香港才有歸屬感。而且，住屋問題日益嚴重，政府應謹慎處理。

食住都是生活最基本的需要，卻是香港所面對的迫切難題。政府要細心思量，及早解決。



香港各界解讀仇富現象

香港怨氣、國民戾氣。以為是在仇富，其實香港和內地的民衆兩者都不是，大家只是在思考如何致富，可以多點付出、多點努力、克勤克儉，便可踏上成功的階梯。陶傑認為「殖民地時代富貧絕不對立，今日富貧水火不容。殖民地時代，香港之富，從實幹中來；今日特區，富從泡沫中生。」地價高漲，可使特區收入穩定、地產商靠樓市賺了大錢。內地富商挾持了人民的血汗金錢，炒高了樓市。影響所及，工資追不上樓價漲幅，富了商人、窮了人民。香港市民分享不到內地和香港融合的機遇，內地民衆分享不到國家富強的好處，才是核心問題所在。

有言說：「香港是一個四不像，為富者卻不仁，要求香港人如日本人般勤奮工作，卻拒絕學習日本的企業照顧弱者文化；要求香港人繼續擁有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的獅子山精神，當權者卻拒絕提供一個公平、開放的晉升機會。」筆者生活成長於一個相信個人努力可以達至成功的年代。某情況下，是否富足沒有特定標準，但要拿起物價和工資去秤量，便會發現新一代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社會。

此次文化堂出版「大仇富」（上圖），就找來24位各界精英，齊揮辣筆勤書。現節錄當中數段精采篇章，與大家

一起解讀仇富。

「包玉剛年輕時奔走買船，與西方政要打關係，許多人無法做得到，是一種才華。今日特區之富，不要才幹，只要有一個好爸爸，鏈接中港權貴關係，金錢滾滾淹至，穩如泰山。今日香港，學盡了中西方的壞處。中國的主權裙帶制度，在縱的一面，保障了財富的世襲壟斷；在橫的一面，『財富』不由工業務實而得，而採用了美國的金融財技模式。美國玩得起這等吹波波的財金幻術遊戲，香港無此資本。」

香港人並不仇商也不仇富，卻對不公平不義的斂財行爲，十分反感。健康的社會也應對人民給予合理的經濟回報與社會回報，經濟回報固然指合理的工資、工時及其他勞工保障，而社會回報就是一個社會認可身份（recognition），社會認同其工作的價值和意義，這種認可應不分高低、一視同仁。基層根本不應獲得如此差的待遇，他們應得的回報和尊重甚至應不下於醫生、老師。

「所謂香港精神，不是仇富，是維護能成為富人的機會，那條人人平等的致富梯階。」

優質圖書館網絡主席 呂志剛
sidneylui@gmail.com

學者獻計拉近貧富差距

我在研究院學習的時候，曾研究過文化大革命時代的大學教育，翻閱了大量書籍。其中最深刻的一部是王紹光教授的《Failure of Charisma》（已有中譯本），他從社會矛盾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與過程。此後，我便追捧他的著作，學習他的學術觀點。他的《安邦之道——國家轉型的目標與途徑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7年）（右圖），是近年我為了教授通識科，最常閱讀的書籍。書中不但討論了內地有關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等議題，更為當前的局勢提出了不少建設性的主張。

首先，王教授認為今天中國社會上最大的問題是分配不平等。在現代社會中，再分配機制至關重要。它不僅關係到社會公正問題，更是社會穩定的基石。從大量數據的分析中，中國正面對3個不平等的問題：省際之間的不平等正在擴大、地區發展差距非常大、人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。在中國，不少人相信不平等有利於經濟增長。然而很多最新的研究都表明，分配不公平往往導致經濟增長速度的停滯不前。更為

嚴重的是，如果只有少數地區、少數人口和少數階層能從市場轉型和經濟增長中獲利的話，人們對不平等的忍耐力就會降低，不滿情緒遲早要爆發。沒有任何政府能在經濟極端不平等的條件下維持政治穩定。

此外，他提出了6項政策建議，阻止差距不斷擴大。建議如下：

- 取消向沿海地區傾斜的優惠；
- 重建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；
- 消除貧困；
- 保證最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務；
- 改善落後地區的基礎設施；

本書除了討論國家的公平議題之外，亦大量討論了民主、公民社會。本書對教授通識科的老師，有很高的參考價值。如欲找尋更多與中國議題有關的參考資料，可閱讀王教授的《中國國家能力報告》（與胡鞍鋼合著）和《民主四講》。

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
henrilee@graduate.hku.hk